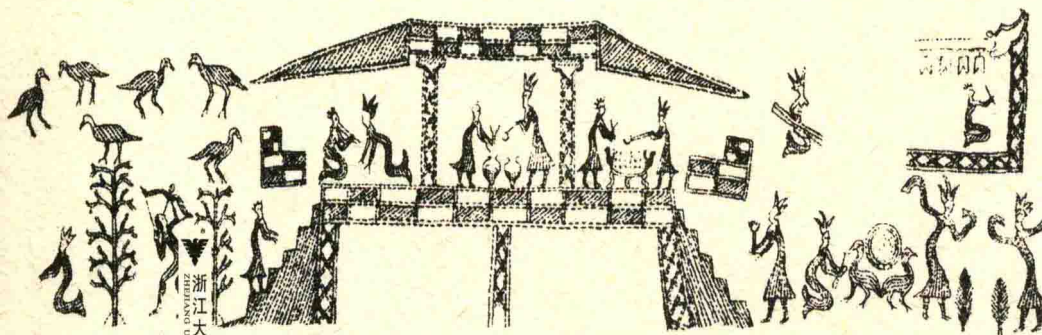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艺术史丛书 黄厚明 主编

# 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

吴小平 蒋璐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

吴小平 蒋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 / 吴小平, 蒋璐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308-14527-5

I. ①汉… II. ①吴…②蒋… III. ①铜器纹饰(考古)—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1234 号

## 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

吴小平 蒋璐 著

---

责任编辑 殷尧(yinyao@ymail.com)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5  
字数 146千  
版印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4527-5  
定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本书得到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图像整理与研究创新平台

资助出版

## “浙江大学艺术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张 曦 罗卫东

副 主 任 曹锦炎 黄厚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王小松 | 王云路 | 王钟涛 | 方志伟 |
| 朱良志 | 朱春秧 | 池长庆 | 严建强 |
| 苏宏斌 | 李承华 | 吴小平 | 吴晓明 |
| 邱忠鸣 | 余 辉 | 邹广胜 | 汪永江 |
| 沈华清 | 沈语冰 | 陆敏珍 | 陈谷香 |
| 陈振濂 | 陈 健 | 林 如 | 金晓明 |
| 周积寅 | 胡小军 | 胡志毅 | 顾 平 |
| 徐 亮 | 郭 翀 | 谈生广 | 陶 然 |
| 黄 杰 | 黄河清 | 黄宝忠 | 黄 鼎 |
| 黄 擎 | 盘 剑 | 章宏伟 | 谢继胜 |
| 楼可程 | 缪 哲 |     |     |

## “浙江大学艺术史丛书”序言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学术转型。自 1764 年德国学者温克尔曼(J. J. Winckelmann)首次使用“艺术史”这一术语以来,以研究实物作品为中心的古物学便逐渐从传统的文献学之中分离出来,并进而在理论上掀起了一波波探究实物作品与历史感之间有机联系的艺术史学科运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对实物作品形式分析方法的达成和完善,成为欧美艺术史学科得以确立的界碑。20 世纪上半叶,艺术史形式分析范式被移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艺术研究中,从而将原本基于艺术作品地理方位上的欧洲中心视点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全球化学科视野。1947 年,由于学科研究范式的抵牾,西方的汉学研究领域曾暴发了一场关于“汉学还是艺术史”的大讨论。这次论辩带来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让后继者意识到艺术史研究中单纯的恋物倾向和文献主义各自的优缺,从而为其后的艺术史学科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20 世纪 60—80 年代,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和泛化,艺术史研究再次发生重大的转型,其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学科间的互动、交流,使得艺术史研究跨学科趋势显著加强,它大大拓展了艺术史学科对其他人文学科研究面向的形塑能力;另一方面,艺术史研究不再秉承于严格的视觉材料划分和视觉语言分析方法之上,研究的边界和研究者的学科身份趋于模糊,并由此加剧了艺术史学科本身的认同危机。

近年来,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以图证史的历史学家以及关注视觉材料

的思想史家,纷纷相遇于艺术史研究场域。如果说此种镜像意味着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史家三者的角色混同,那么,艺术史家的身份、立场和诉求何在?艺术史学科是否需要仰仗其他学科准则才能确立起自身学科存在的价值?这是颇耐人寻味的。诚然,艺术史是历史也是艺术,它除了遵循一般历史学的治学原则以外,还有属于自身的学科纪律,否则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价值就会被消解。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人类创造世界、认识世界的一个智性工具,那么,艺术史的任务就是准确理解和描述这种智性模式。更而言之,艺术史研究主要凭藉艺术的智性工具——实物图像和文字还原并解释这种智性模式。

从艺术史学科立场看,通过实物图像理解历史,是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信仰与使命。不可否认,实物图像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原本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但实物图像的历史相对性并不意味着价值的相对主义。一方面,我们承认,处于历史之中的实物图像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对于研究者而言具有一种先在性,后来者不能对之任意塑造;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价值的这种先在性,就把实物图像材料的形式演变看成是一个自足、自闭、自律的排它性体系。这种内在规定性,决定了艺术史学科既要严守实物图像研究的进路,同时又要在不同的研究手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物图像和文字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利,但对艺术史学科而言,文字证据只是旁证,它的价值最终需要通过或回归视觉证据而获得。诚如哈斯科尔(Francis Haskell)所启示的那样:“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只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即充分认识到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必然差异,而不是像通常所暗示的那样,假称两者的方法并无二致。”(《图像及其历史》)从一般历史学立场看,以文献研究为主业的学者,由于文字本身在塑造人类文化、行为与认知的显性作用,容易在艺术史跨学科研究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艾兰(Sarah Allan)认为:“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文献的记载,给与了过去一种固定的形态,不因事件的远逝和记忆的模糊而变形;通过文献的记载,人的思想观念得以外化而有了自己的生命。艺术发展到这一阶段便会从属于概念,用以描述主要以语言表达的观念。”(《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这种知识生产所固化的概念系统一旦脱离了人的视知

觉系统而存在,研究者的眼睛容易退化为鲁道夫·阿恩海姆(R. Arnheim)所讲的“纯粹是度量和辨别的工具”。所以,无论是作为旁证的文献,还是作为视觉证据的图像,研究者必须正视它们在跨学科语境中的学科角色与功用。对于艺术史跨学科研究而言,如果研究者自身的学科意识和自律性不够,不同的研究范式难免会沦为相互歧见的话语工具。

艺术史研究本是一宗门槛极高的学科,出色的艺术史研究者,不仅需要通晓艺术本体语言的能力,而且也需要通过历史文献学、实物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合谋,对视觉材料的“历史原境”进行复原,并在这个原境中对艺术作品进行“历史化”的理解。作为正在成长的年轻学科,艺术史在中国虽然还没有看到它的枝繁叶茂,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它无疑已经迎来了全新的学科生态:艺术从属于文学一脉的时代已经结束,而艺术史作为辅助学科服务于艺术实践的格局也取得很大程度的改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艺术史教育作为艺术教育重要一脉,在推动人文学科学互动发展、提升大学通识教育水平、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近十年来,国内不少高校增设了艺术史专业,各种艺术史丛书也相继问世,这是艺术史学科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个表征。面对新一轮的学科建设态势,如何发挥和推动艺术史学科在整个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中的引领作用,浙江大学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过去的一个世纪,浙江大学曾一度引领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我们熟知的20世纪许多公认的艺术教育家、艺术大师如马一浮、王遽常、沙孟海、陆维钊、常书鸿、姜亮夫、吴冠中等,都与浙江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1928年,浙江大学更以主人翁的姿态,在自己的校园内迎来了杭州国立艺术院的诞生。1998年,新浙江大学组建以来,学校审时度势,成立了艺术学系(艺术学院),并围绕艺术史教学与研究的相关要素进行学科整体布局。鉴于实物图像资源在知识传承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浙江大学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该中心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历代绘画作品进行系统调查、整理、研究和出版。这些年来,在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故宫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曦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作组已经陆续出版了《宋画全集》、《元画

全集》,《战国—唐画全集》、《明画全集》和《清画全集》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近年来,围绕中国图像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浙江大学还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等校外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先后成立了“故宫学研究中心”、“亚洲图像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图像整理与研究创新平台”等校级研究机构。除此之外,浙江大学还成立了“文化遗产研究院”,并凭藉社会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建立了一座用以艺术史教学和研究的“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这些带有探索性的举措和布局,旨在通过实物图像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和传播,使艺术史学科在高校教育中能够真正承担起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作为浙江大学艺术史学科建设计划的一部分,这套艺术史丛书包罗了不同的研究面向。虽然完美或理想的艺术史研究,需要将图像、实物、文献和理论主张熔于一炉以求获得对特定研究对象的通盘认知,但囿于艺术史知识地图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以及研究者不尽相同的研究手段、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每本著作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气质。就丛书编委会的立场而言,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体现浙江大学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考古、中国传统画学、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四个研究方向上的建设成果。我们也期盼,该丛书的出版,不是搭设擂台的道具,而是艺术史学术共同体可以共享的精神家园。

黄一揆

2014年10月1日

# 目录

|                       |    |
|-----------------------|----|
| 第一章 引言 .....          | 1  |
| 第二章 甲类刻纹铜器 .....      | 2  |
| 第一节 器类、纹饰及时代 .....    | 2  |
| 第二节 使用对象考察 .....      | 22 |
| 第三节 定名和制作地 .....      | 24 |
| 第三章 乙类刻纹铜器 .....      | 27 |
| 第一节 器类、纹饰的类型学考察 ..... | 27 |
| 第二节 分期 .....          | 78 |
| 第三节 使用者身份的考察 .....    | 80 |
| 第四节 定名和制作地域 .....     | 84 |
| 第四章 丙类刻纹铜器 .....      | 86 |
| 第一节 器类、纹饰与时代 .....    | 86 |
| 第二节 使用对象考察 .....      | 94 |
| 第三节 制作地 .....         | 96 |

第五章 甲、乙、丙刻纹铜器的关系 ..... 98

第六章 汉代刻纹铜器的源头考证 ..... 104

第七章 汉代刻纹铜器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背景 ..... 117

第八章 附论刻纹铜器的性质 ..... 121

参考文献 ..... 123

索引 ..... 131

后记 ..... 132

## 第一章 引言

刻纹铜器,即在器壁上用刀之类的锐器刻画花纹图像的铜器,其在我国大致出现在春秋中晚期至汉代。当前学界东周刻纹铜器的研究颇丰<sup>①</sup>,但对于秦汉时期刻纹铜器则很少关注<sup>②</sup>。无疑,汉代刻纹铜器是东周刻纹铜器的发展和延续,也是汉代铜器技术发展的巅峰之作,因此对其研究,将大大丰富我国古代铜器研究的内涵,对于汉代考古也是极大的补充。

本书尝试在全面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器类、纹饰方面的差异,将汉代刻纹铜器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讨论各类铜器在器形、装饰题材及布局、时空分布方面的特征,并试图建立起各个区域刻纹铜器的发展脉络,藉此考察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探究其源流奠定基础,最终完成对汉代刻纹铜器的总体发展变化谱系考察,最后附论其性质用途。

---

① 叶小燕:《东周刻纹铜器》,《考古》,1983年第2期。张广立:《东周青铜器刻纹》,《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叶小燕:《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贺西林:《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研究》,《美术研究》,1995年第1期。刘建国:《春秋刻纹铜器初论》,《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林留根、施玉平:《试论东周刻纹铜器的起源及分期》,《文物研究》(第六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许雅惠:《东周的图像纹铜器与刻纹铜器》,《故宫学术集刊》(第二十卷第二期)。

② 目前所见唯有三文。蒋廷瑜侧重于岭南所出刻纹铜器的器类、制作工艺和制作中心进行了探讨(《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艾兰则偏重于岭南刻纹铜器制作族群的考察(艾兰:《一组汉代针刻铜器》,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黄德荣就滇国所出刻纹铜器器类和技法进行了考察[《滇国青铜器上的线划技术》,《古代文明》(第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第二章 甲类刻纹铜器

甲类刻纹铜器器形主要有:剑、斧、戈、甲、剑簋、贮贝器、犁、锄、卷刃器、扣饰、锥、长颈壶和各种动物模型等。

### 第一节 器类、纹饰及时代

#### 一、剑

目前发现 17 件,均出自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

晋宁石寨山出土 12 件。<sup>①</sup>

M6:39,在剑身近格处两面各阴刻一虎,蹲伏,首回顾做咆哮状,尾略上卷(图 2-1-1)。

M13:233b,剑身近格处两面各阴刻一凤首龙身长尾异兽,首尾各有四条须状物(图 2-1-2)。

M13:233a、71,两面各刻一金钱豹,豹首回顾做咆哮状,尾略卷(图 2-1-3)。

M13:313,刻鹿纹。

M13:172,刃部两面阴线浅刻人、虎、猴搏斗图像。一人骑在虎上,右手

---

<sup>①</sup>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 年第 9 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执剑刺虎,虎咬着人的肩胛,猴子抱着虎尾(图 2-1-4)。

M13:219,茎上作两蛇缠绕状,刃上一面阴刻一虎,虎后为一蜂,另一面阴刻一金钱花豹,一猴抱着豹尾作噬状(图 2-1-5)。

M6:21,茎上为旋涡状的图案,刃上阴刻人、虎、猴搏斗图像,与 M13:172 图案相同(图 2-1-6)。

M13:316,茎上阴刻旋涡纹。

M6:68,剑身刻竖线纹,侧面刻卷云纹。

M71:32、30,剑身基部阴刻螺旋纹及卷草纹组成的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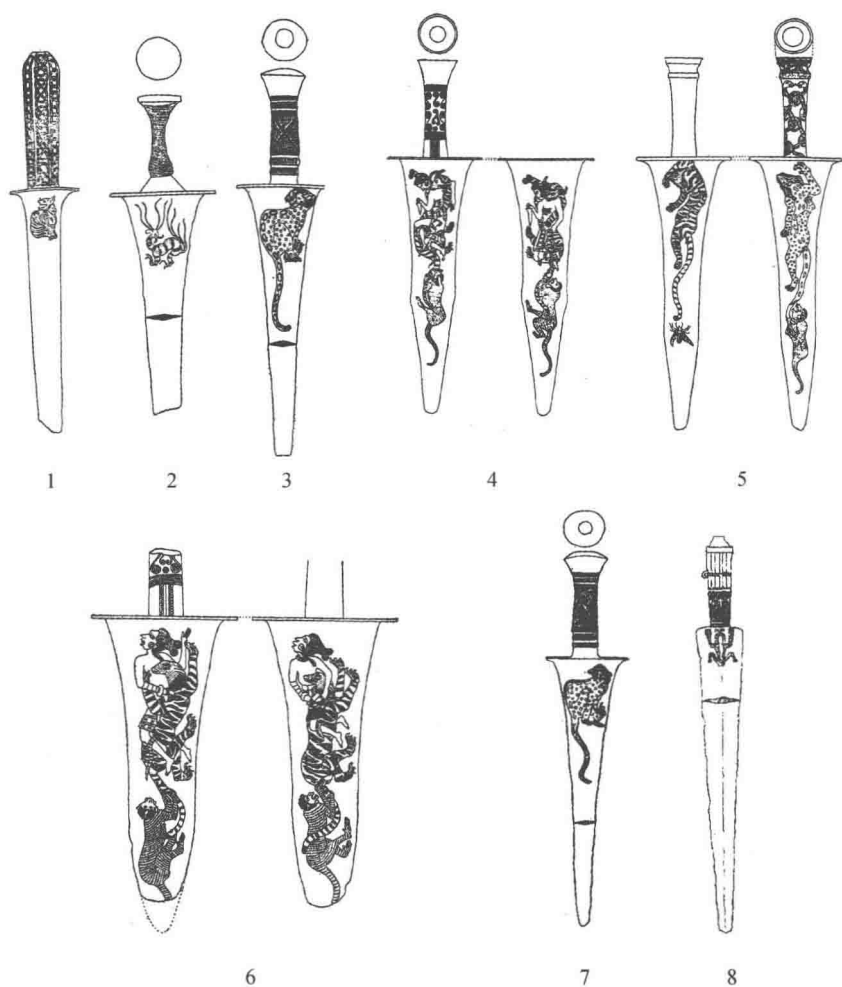


图 2-1 剑

1. 晋宁石寨山 M6:39; 2. M13:233b; 3. M13:71; 4. M13:172; 5. M13:219;  
6. M6:21; 7. M40:25; 8. 江川李家山 M24:82

M40:25,剑身近格处两面各刻一豹,呈蹲伏状(图 2-1-7)。

江川李家山出土 5 件。<sup>①</sup>

M24:82、80、84、101a、101b,均在刃部后端阴刻一蛙(图 2-1-8)。

## 二、戈

晋宁石寨山出土 4 件,另外在呈贡天子庙出土 1 件,江川李家山也有出土。<sup>②</sup>

M71:150,銎部中心阴刻虎纹,两侧为卷云纹,援上浅刻蛙人。虎的形态不同,一虎为回首咆哮卷尾状,另一虎为昂首咆哮卷尾状(图 2-2)。

M13:170、M10:49、M12:21,均在銎部一侧阴刻一虎。

呈贡天子庙 M41 出土 1 件,阴刻平行纹。

江川李家山出土 1 件,銎部有阴刻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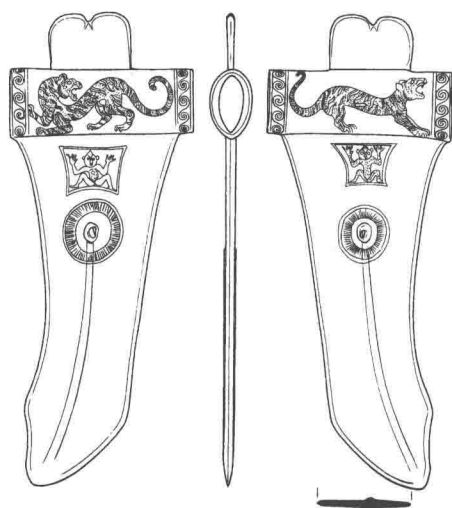


图 2-2 戈

晋宁石寨山 M71:150

<sup>①</sup>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报告中仅有 M24:82 图片。

<sup>②</sup>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 年第 4 期。江川李家山所出,转引黄文。

### 三、斧铎

共 5 件。

晋宁石寨山出土 3 件。<sup>①</sup>

M71:198, 銎部以下阴刻相背孔雀, 其首均为反顾状, 中为一类似知了的昆虫(图 2-3)。

M13:119, 銎部刻有纹饰, 图案不明。

M13:158, 銎部下端刻一牛头。

呈贡天子庙 M41 出土 2 件。M41:206, 銎正面阴刻弦纹、绳纹及一斜田字形符号。M41:210, 底面阴刻四斜“田”字形符号。<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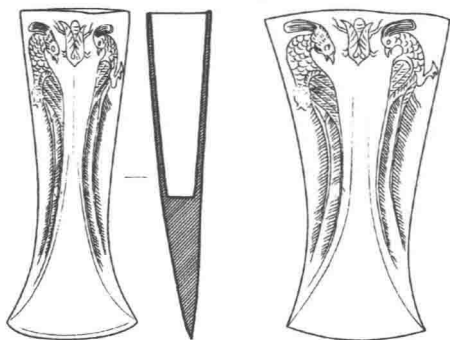


图 2-3 斧铎  
晋宁石寨山 M71:198

### 四、枕

江川李家山出土 1 件, 器身阴线刻出牛、虎等动物图案。<sup>③</sup>

### 五、盒

江川李家山 M13:16, 正面有凸起圆泡四行, 圆泡周围线刻带纹环绕, 背

①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

②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③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面亦有线刻纹饰。<sup>①</sup>

## 六、钺

江川李家山出土 1 件,柄部有阴刻人物图案。<sup>②</sup>

## 七、犁

晋宁石寨山出土 1 件<sup>③</sup>。M5:31,犁身两侧阴刻凤。

## 八、锄

晋宁石寨山出土 3 件<sup>④</sup>。

M12:104,叶右边阴刻一孔雀,左边为一牛头,脊部中心刻卷云纹,其上端为三角锯齿纹和平行线。(图 2-4-1)

M13:113,两面阴刻云纹。

M13:130,阴刻一对孔雀。(图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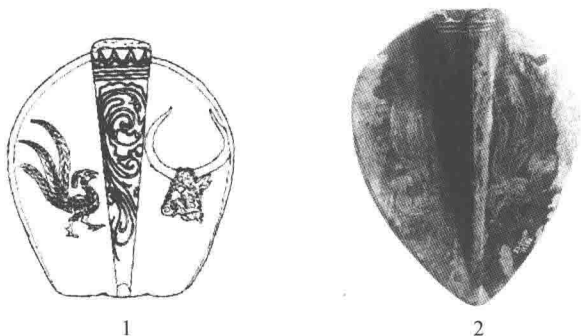


图 2-4 锄

1. 晋宁石寨山 M12:104; 2. 晋宁石寨山 M13:130

## 九、镰

晋宁石寨山出土 1 件<sup>⑤</sup>。M13:186,刃上有阴刻的蛇咬鱼图像。

①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②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③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

④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书中仅有文字描述,线图转引黄德荣先生文。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年。